

闻一多 著

唐诗杂论 诗与批评

四杰

杜甫

贾岛

宫体诗的自赎

英译李太白诗

女神之地方色彩

白朗宁夫人的情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闻一多 著

唐诗杂论
诗与批评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诗杂论 诗与批评/闻一多著 .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11

(三联精选)

ISBN 7-108-01342-8

I . 唐… II . 闻… III . ①唐诗 - 文学评论 - 中国 - 现代
②新诗 - 文学评论 - 中国 - 现代 IV .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9771 号

唐诗杂论 诗与批评



责任编辑 郑 勇

封面设计 宁成春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隆昌印刷厂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7.5 印张 124 千字

1999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01-10,000 册

ISBN 7-108-01342-8/1 · 246 定价 10.00 元

三联精选 缘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成立以来，本着生活书店创始人邹韬奋先生“竭诚为读者服务”的宗旨，为几代读书人提供了大量优秀图书，也由此逐渐形成了三联图书的风格与特色。

多年以来，由于主要致力于推介新作，许多曾经在读书人中产生过广泛影响的书，无暇顾及重印，读者呼唤重印之声不绝。其中尤以一些出自大家之手的小书，既是厚积薄发之作，落笔为文而又平易畅达，堪称书林经典，备受读者眷顾。精品的价值在于传世久远；经典的意义在于常读常新，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它们依然是读书人书架上的必备品，或枕边的常读书。值三联书店成立 50 周年之际，我们从半个世纪以来三联版图书中，整理甄选出一批兼具人文精神与思想智慧的精品；同时也遴选一些非三联旧版，但品格相近的图书加入其中，辑为“三联精选”文库。文库秉承译域外菁华与开掘本土资源并重的传统，兼收著述与译作。收录作品力求篇幅短小，而且文字平易，借以体现我们一向注重学术普及与文化积累的理念。为方便读者庋藏，统一开本版式，重加录排校订。同时，基于面向普通读者的考虑，力求价格低廉。今后我们将秉此标准与宗旨，陆续精选，以副广大读者厚望。谨布区区之诚，希望得到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年 8 月

第一辑



经典常谈	朱自清 著
论雅俗共赏	朱自清 著
诗论	朱光潜 著
文章修养	唐弢 著
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	钱穆 著
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 生活史话	邹韬奋 著
语文常谈	吕叔湘 著
英诗的境界	王佐良 著
在语词的密林里	陈原 著
庄子浅说	陈鼓应 著

第二辑



- 周天集 [印]室利阿罗频多 著 徐梵澄 译
- 基督的人生观 [英]詹姆士·里德 著 蒋 庆 译
- 道德箴言录 [法]拉罗什福科 著 何怀宏 译
- 生活的艺术 [法]莫洛亚 著 王 辉 等译
- 西西弗的神话 [法]加 缪 著 杜小真 译
- 活出意义来 [奥]弗兰克 著 赵可式 等译
- 美国学者 [美]爱默生 著 赵一凡 译
- 代表人物 [美]爱默生 著 蒲 隆 译
- 六大观念 [美]艾德勒 著 郦庆华 等译
- 书的礼赞 茨威格 等著 叶灵凤 译

第三辑



- 读书与治学 胡适著
- 唐诗杂论 诗与批评 闻一多著
- 文心 夏丏尊 叶圣陶著
- 清华园日记 西行日记(增补本) 浦江清著
- 蛇与塔 聂绀弩著
- 文坛三忆 曹聚仁著
- 北京城杂忆 萧乾著
- 美学四讲 李泽厚著
- 语言与社会生活 陈原著
- 杂忆与杂写 杨绛著

目 录

唐诗杂论

类书与诗	3
宫体诗的自赎	12
四杰	25
孟浩然	34
贾岛	40
杜甫	47
英译李太白诗	64

目

录

1

诗与批评

白朗宁夫人的情诗	77
《冬夜》评论	85
《女神》之时代精神	123
《女神》之地方色彩	132

《烙印》序	140
《西南采风录》序	144
《三盘鼓》序	148
时代的鼓手	150
——读田间的诗	
文艺与爱国	155
——纪念三月十八	
邓以蛰《诗与历史》题记	158
诗人的横蛮	161
诗的格律	163
先拉飞主义	173
戏剧的歧途	189
泰果尔批评	194
谈商籁体	200
论《悔与回》	202

附 录

从宗教论中西风格	207
五四运动的历史法则	215
新文艺和文学遗产	218
诗与批评	221
艾青和田间	229

唐
诗
杂
论

类书与诗

检讨的范围是唐代开国后约略五十年，从高祖受禅(六一八)起，到高宗武后交割政权(六六〇)止。靠近那五十年的尾上，上官仪伏诛，算是强制地把“江左余风”收束了，同时新时代的先驱，四杰及杜审言，刚刚走进创作的年华，沈、宋与陈子昂也先后诞生了，唐代文学这才扯开六朝的罩纱，露出自家的面目。所以我们要谈的这五十年，说是唐的头，倒不如说是六朝的尾。

寻常我们提起六朝，只记得它的文学，不知道那时期对于学术的兴趣更加浓厚。唐初五十年所以像六朝，也正在这一点。这时期如果在文学史上占有任何位置，不是因为它在文学本身上有多少价值，而是因为它对于文学的研究特别热心，一方面把文学当作学术来研究，同时又用一种偏向于文学的观点来研究其余的学术。给前一方面举个例，便是曹宪、李善等的“选学”(这回文学的研究真是在学术中正式地分占了一

席。)后一方面的例，最好举史学。许是因为他们有¹种特殊的文学观念(即《文选》所代表文学观念)，唐初的人们对于《汉书》的爱好，远在爱好《史记》之上，在研究《汉书》时，他们的对象不仅是历史，而且是记载历史的文字。便拿李善来讲，他是注过《文选》的，也撰过一部《汉书辨惑》，《文选》与《汉书》在李善眼里，恐怕真是同样性质，具有同样功用的物件，都是给文学家供驱使的材料。他这态度可以代表那整个时代。这种现象在修史上也不是例外。只把姚思廉除开，当时修史的人们谁不是借作史书的机会来叫卖他们的文藻——尤其是《晋书》的著者！至于音韵学与文学的姻缘，更是显著，不用多讲了。

4

当时的著述物中，还有一个可以称为第三种性质的东西，那便是类书，它既不全是文学，又不全是学术，而是介乎二者之间的一种东西，或是说兼有二者的混合体。这种畸形的产物，最足以代表唐初的那种太像文学的学术，和太像学术的文学了。所以我们若要明白唐初五十年的文学，最好的方法也是拿文学和类书排在一起打量。

现存的类书，如《北堂书钞》和《艺文类聚》，在当时所制造的这类出品中，只占极小部分。此外，太宗时编的，还有一千卷的《文思博要》。后来从龙朔到开元，中间又有官修的《累璧》六百三十卷，《瑶山玉彩》五百卷，《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增广皇览》及《文思博要》)，

《芳树要览》三百卷,《事类》一百三十卷,《初学记》三十卷,《文府》二十卷,私撰的《碧玉芳林》四百五十卷,《玉藻琼林》一百卷,《笔海》十卷。这里除《初学记》之外,如今都不存在。内中是否有分类的总集,像《文馆词林》似的,我们不知道。但是《文馆词林》的性质,离《北堂书钞》虽较远,离《艺文类聚》却接近些了。欧阳询在《艺文类聚·序》里说是嫌“流别《文选》,专取其文,《皇览》遍略,直书其事”的办法不妥,他们(《艺文类聚》的编者不只他一人)才采取了“事居其前,文列于后”的体例。这可见《艺文类聚》是兼有总集(流别《文选》)与类书(《皇览》遍略)的性质,也可见他们看待总集与看待类书的态度差不多。《文馆词林》是和流别《文选》一类的书,在他们眼里,当然也和《皇览》遍略差不多了。再退一步讲,《文馆词林》的性质与《艺文类聚》一半相同,后者既是类书,前者起码也有一半类书的资格。

上面所举的书名,不过是就新旧《唐书》和《唐会要》等书中随便摘下来的,也许还有遗漏。但只看这里所列的,已足令人惊诧了。特别是官修的占大多数,真令人不解。如果它们是《通典》一类的,或《大英百科全书》一类的性质,也许我们还会嫌它们的数量太小。但它们不过是“兔园册子”的后身,充其量也不过是规模较大品质较高的“兔园册子”。一个国家的政府从百忙中抽调出许多第一流人才来编了那许多的“兔园册子”(太宗时,房玄龄、魏征、岑文本、许敬宗等都参与过这

种工作)。这用现代人的眼光看来,岂不滑稽?不,这正是唐太宗提倡文学的方法,而他所谓的文学,用这样的方法提创,也是很对的。沉思翰藻谓之文的主张,由来已久,加之六朝以来有文学嗜好的帝王特别多,文学要求其与帝王们的身份相称,自然觉得沉思翰藻的主义最适合他们的条件了。文学由太宗来提倡,更不能不出于这一途。本来这种专在词藻的量上逞能的作风,需用学力比需用性灵的机会多,这实在是文学的实际化了。南朝的文学既已经在实际化的过程中,隋统一后,又和北方的极端实际的学术正面接触了,于是依照“水流湿,火就燥”的物理原则,已经实际化了的文学便不能不愈加实际化,以致到了唐初,再经太宗的怂恿,便终于被学术同化了。

文学被学术同化的结果,可分三方面来说。一方面是章句的研究,可以李善为代表;另一方面是类书的编纂,可以号称博学的《兔园册子》与《北堂书钞》的编者虞世南为代表;第三方面便是文学本身的堆砌性,这方面很难推出一个代表来,因为当时一般文学者的体干似乎是一样高矮,挑不出一个特别魁梧的例子来。没有办法,我们只好举唐太宗。并不是说太宗堆砌得成绩比别人精,或是他堆砌得比别人更甚,不过以一个帝王的地位,他的影响定不是一般人所能比的,而且他也曾经很明白地为这种文体张目过(这证据我们不久就要提出)。我们现在且把章句的研究,类书的纂辑,

与夫文学本身的堆砌性三方面的关系谈一谈。

李善绰号“书簏”，因为，据史书说，他是一个“淹贯古今，不能属辞”的人。史书又说他始初注《文选》，“释事而忘意”，经他儿子李邕补益一次，才做到“附事以见义”的地步。李善这种只顾“事”，不顾“意”的态度，其实是与类书家一样的。章句家是书簏，类书家也是书簏。章句家是“释事而忘意”，类书家便是“采事而忘意”了。我这种说法并不苛刻。只消举出《群书治要》来和《北堂书钞》或《艺文类聚》比一比，你便明白。同是钞书，同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但拿来和《治要》的“主意”的质素一比，《书钞类聚》“主事”的质素便显着格外分明了。章句家与类书家的态度，根本相同，创作家又何尝两样？假如选出五种书，把它们排成下面这样的次第：

《文选注》，《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初唐某家的诗集。

我们便看出一首初唐诗在构成程序中的几个阶段。劈头是“书簏”，收尾是一首唐初五十年间的诗，中间是从较散漫，较零星的“事”，逐渐地整齐化与分化。五种书同是“事”（文家称为词藻）的征集与排比，同是一种机械的工作，其间只有工作精粗的程度差别，没有性质的悬殊。这里《初学记》虽是开元间的产物，但实足以代表较早的一个时期的态度。在我们讨论的范围内，这部书的体裁，看来最有趣。每一项题目下，最初是“叙事”，其次“事对”，最后便是成篇的诗赋或文。其实这

三项中减去“事对”，就等于《艺文类聚》；再减去诗赋文，便等于《北堂书钞》。所以我们由《书钞》看到《初学记》，便看出了一部类书的进化史，而在这类书的进化中，一首初唐诗的构成程序也就完全暴露出来了。你想，一首诗做到有了“事对”的程度，岂不是已经成功了一半吗？余剩的工作，无非是将“事对”装潢成五个字一幅的更完整的对联，拼上韵脚，再安上一头一尾罢了。（五言律是当时最风行的体裁，但这里，我没有把调平仄算进去，因为当时的诗，平仄多半是不调的。）这样看来，若说唐初五十年间的类书是较粗糙的诗，他们的诗是较精密的类书，许不算强词夺理吧？

《旧唐书·文苑传》里所收的作家，虽有着不少的诗人，但除了崔信明的一句“枫落吴江冷”是类书的范围所容纳不下的，其余作家的产品不干脆就是变相的类书吗？唐太宗之不如隋炀帝，不仅在没有作过一篇《饮马长城窟行》而已，便拿那“南化”了的隋炀帝，和“南化”了的唐太宗打比，像前者的：

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

甚至：

鸟击初移树，鱼寒不隐苔。^{〔1〕}

〔1〕《隋遗录》所载炀帝诸诗皆明秀可诵，然系唐人伪托。《铁围山丛话》引佚句“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亦伪。